

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发展及方法论评价

曾中秋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社科部,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这个假设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已超越经济学的边界被移植到政治学乃至社会学中, 由此导致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对社会行为进行统一解释的思潮。从方法论角度看, 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 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规定, 忽视了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 理性;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 04 - 0015 - 04

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 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点上发育起来的。不论这个假设是作为“经验命题”提出, 还是作为“构造性命题”抑或是“策略性命题”看待, 它的作用均在于提供理论推理链条的起点, 由此建造起关于经济活动的带有演绎性质的理论, 用以解释经济秩序的形成、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如此,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经济人假设正超越经济学的边界, 逐渐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 在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潮中扮演着攻城拔寨的角色。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以及与之相应的复杂交换范式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引入政治和行政领域, 并因此而使其主要创始人布坎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 年)。家庭经济学又把经济人假设以及与之相应的模式和方法引入社会学领域, 并因此使它的主要创始人贝克尔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92 年)。这样, 社会科学的三大经验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实际上正以经济人假设为共同基点而寻找对社会行为的统一理论解释。

“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导致的此种“理论同型”现象, 固然反映了科学追求更加普适、更加统一理论的一种愿望, 然而“同型”的基点却需要认真审视。近代自然科学曾在“原子论”的基点上, 完成了一次知识大综合。“电磁场”论改变了这个基点, 完成了另一次知识大综合。而 20 世纪的科学革命却在“大统一理论”和“超统一理论”的方向上寻找新的基点。整合固然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而整合基点的选择却关系此种趋势的进步性。正因为如此, 对经济人假设的性质

及其合理性进行审视, 既是经济学也是一般社会科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抛砖引玉, 试从对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发展的梳理入手, 从方法论角度评价经济人假设的得失。

一 经济人假设渊源与发展

通常认为, 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充实的, 但它的基本含义已表述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斯密首次论述了自利性、交换、经济秩序的内在一致性。他认为, 以物易物的交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 交换的动力来自自利, 交换的结果则是经济秩序的形成, 并由此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斯密指出: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1] 在这里斯密显然是把自利性作为人性的一般规定引入经济分析, 并视为经济活动的动力。由此前进一步, 斯密引入“看不见的手”原理, 用以把自利动力与经济秩序乃至“社会利益”联系起来。看不见的手即是市场, 市场既是个人经济自由的舞台, 又是最厉害的监管者, 人们以利己之心为动力, 以竞争为调节者, 使供求趋于平衡, 把自利本能在合于理性的情况下化为社会品德, 把复杂的非理性世界简化为一个理性的框架。这样斯密不仅设定了经济动力, 又打通了由经济动力向经济秩序的推理链条, 进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斯密虽然提出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想, 但在它的现成形式下, 显得过于抽象和单薄。它虽然可以说明经济活动中人

【收稿日期】 2004 - 01 - 07

【作者简介】 曾中秋(1972 -), 女,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讲师, 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

们为什么要做,却不足以说明怎样去做,在理论上需要对自利原则有进一步规定。“边际革命”充当了这个角色,它为自利性附加了边际理性的内容,从而使自利走向了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

当边际效用学派把效用概念和微积分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时候,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就进入了经济学。这些研究的进展为斯密理论中的“自身利益”问题提供一种纵深分析的工具。当效用被推向边际时,表现为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为利己性复合了饱含性、最大化的规定。在这里,斯密的“利己之心”被推进为“利益最大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帕累托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并为它附加了“边际理性”的规定。按此规定,经济人不仅追求个人利益,而且精于计算,能在权衡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中获取最大效用。从此经济人成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边际革命中的经济人概念虽然是原子式的乃至鲁滨逊式的个体,但以此为基点却能建立更加简明、连贯和彻底的经济理论,因而边际革命所主张的经济理性被延续下来,并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推进,构成了经济理论中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运动。瓦尔拉斯在 1874 年用三组代数方程式建构了一般均衡的模型。这个可能性命题当时没有得到严格证明,直至阿罗·德布鲁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使用拓扑学和集合论才证明了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德布鲁假定:消费者偏好具有完备性、自反性和传递性等性质;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具有闭性和凸性。消费者偏好的一系列假定,意味着消费者对自己的偏好有完全了解,这等于是在完全信息下的一种判断。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的闭性假设,意味着全部可能的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都包含在选择之内,而凸性假设则意味着在完全信息下,主体具有极强的计算能力,能够在全部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使其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点。此时的经济人不仅有寻求最大化的目的,而且有完全信息下作出选择的手段,这就在事实上赋予了理性以完全性的规定。

可以看出,斯密率先引入的自利性,经由边际革命。一般均衡理论的推进,实际上赋予了经济主体的如下三重基本规定:完全自利(目的)、完全理性(手段)、完全信息(条件)。

符合这些规定的“经济人”在经验上极为罕见,因而理性主义运动推进下的经济人假设已很少作为经验命题看待,不少人视之为构造性命题,仅仅作为一种预测工具而存在,如弗里德曼所说:“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2]。按这种见解,经济人假设本身的正误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推出的预言能否确证,如果成功与失败的企业家之间的确存在着是否按最大利润原则行事的区别,那么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工具就是有效的,这无疑是弱化了的经济人假设。更为弱化的形式,则把它看成策略性命题,如哈耶克所说:“斯密及其同代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这种制度利用人们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作用”^[3]。按这种看法,人的本性原本是多

样化和复杂的,为了减少坏人干坏事的机会,把人假定为利己主义者更为有利于制度设计。

尽管对经济人假设的性质尚有诸多争议,然而它在逻辑和策略上的部分有效性使之不断超出经济学边界向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中渗透,公共选择理论和家庭经济学就是这种渗透的产物。

二 经济人假设在政治学中的渗透

公共选择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后半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推行,曾带给人们一种幻觉,似乎市场的缺陷可由政府的适度干预而弥补。然而,政府的大规模干预,非但没有解决市场的问题,反而出现了公共支出急剧增加、政府结构不断膨胀、公共部门效率日益低下等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把“经济人假设”和“复杂交换范式”引入政治领域,用以回答政府何以也会失灵问题,从而受到普遍的关注。

布坎南明确指出,公共选择观点中渗透着“两个分离而有区别的方面或要素,第一方面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般化的交换科学,第二个方面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有关个人行为的经济人的假设”^[4]。

从交换的视角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和政治过程理解为交易契约及其形成过程。按此观点,在政治领域里生活着的各类人群,既是公共选择者,又是交易主体,他们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既是公共选择过程,又是相互交易过程。选民支付“选票”而获得“福利”,利益集团支付“活动费用”而获得“租金”,政治家支付“政策”而获得“权力”,官僚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得“预算差额”。这样,经由选举、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物品供给而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实质上乃是利益的交易过程。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公共选择理论又把政治交易中的各类主体都视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也都具有充分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能力。按此观点,作为经济人的选民追求的是个人福利最大化,并以此为动力决定是否投票以及如何投票;作为经济人的政治家追求的是选票最大化,并以此为动力决定在何时制定政策以及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作为经济人的政府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并以此为动力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及其数量。布坎南指出,当把经济人假设从市场扩大应用于集体制度环境时,就应该把公共选择的人塑造成效用最大化的人。他们不仅不会按理想的规则行事,而且会极力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界,直到受到抑制为止。自利的公共选择者在交易中所作出的选择是一个交易均衡问题,如果交易均衡向政治家和官僚倾斜,那么政府失灵将难以避免。

可以看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视的是经济人假设——复杂交换——宪制改革的理论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政治活动的动力(公共选择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经由复杂交换过程(选举和制宪),而通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宪制)。这显然是一种经济人逻辑,类同于斯密最早阐发的经济人假设——价格调节——经济秩序的逻辑,差别仅仅在于,斯密关注的是经济市场,而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是政治市场。

问题在于,奠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点上的公共选择理论所研究的仅是政治领域的部分现象,也仅有部分有效性。作为经验性命题,它可以描述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却无法描述热心公益、廉洁奉公者的行为;作为构造性命题,它可以解释政治活动中的诸多弊端和恶习,却难以解释彪炳史册的政治成就和行政业绩;作为策略性命题,它对监督、约束机制的关注富有意义,但对激励、倡导机制却显得无能为力。

三 经济人假设在社会学中的运用

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于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5]因此,他把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尤其是运用于家庭领域中的分析,建立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经济学。家庭经济学是继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经济人假设应用于非市场领域的又一次拓展,也被人们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贝克尔把组成家庭的成员都视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他把效用函数扩大到一些非货币因素。当非货币因素,如子女、健康、地位等同物质产品一样能带给人们极大的效用满足时,家庭就从传统经济学中的单一消费者角色中突破出来,转变为一个生产性单位。最大化目的要求家庭生产对时间要素进行配置,如同企业的分工能达到提高产业的目的,家庭也根据男女的不同生理特点、经验进行分工,男子把更多的时间配置与市场以获得货币,而女子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于家务活动以生产出健康、子女等商品,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从市场和家庭中获益,使家庭产出最大化。贝克尔认为在传统婚姻中,人们结婚的目的就是想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收入,由于男女的不同特点,各自都能够通过组织家庭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对未来风险的保证,因此人们才会选择结婚。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劳动对体能要求的下降和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使传统家庭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发生变化,从而加剧了两性间在就业和婚姻上的冲突。尤其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政府和市场机制已具备了一些培训人力、失业保险、退休保障的功能,这些制度淡化了家庭的保险功能使家庭这一组织更为松散,离婚率不断上升。在家庭中子女是家庭生产的一个主要产品,因此贝克尔对子女的产出也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子女的产出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不断增加的时间价值。子女虽然能够带来效用,但是作为经济人的父母要进行收益——成本的比较,随着父母的时间投入到市场上的价值大大增加时,就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配置在生育子女上,并且随着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而父母所获得收益将不断减少,因此子女的出生率将不断下降。贝克尔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成功解释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通过对效用函数的泛化,使能带来效用满足的商品范围扩大到具有精神价值的产品,从而开创

了对社会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先河。但是贝克尔的分析范式仍然是经济人逻辑,从事家庭活动的动力仍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只是扩充了经济人最大化的范围而已。

问题在于,奠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点之上的家庭经济学也仅仅只能解释家庭行为中的一部分。作为经验性命题,它可以描述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行为,却无法描述一些父母对子女不计回报的投入;作为构造性命题,它可以解释家庭中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这样一些现象,但无法解释在同样社会背景下大量家庭稳定存在这一事实;作为策略性命题,它能对婚姻关系如何用完善的法律契约来保证双方的损失最小提供支持,但对如何走向稳定的婚姻关系却无进一步作用。

四 方法论评价

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理论渊源及其理论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出经济人假设在自身的演进中也经历着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然而,经济人假设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前提预设,同时也贯串着一种研究方法,正是这种研究方法导致了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评价经济人假设的得失。确如布劳恩在其名著《经济学方法论》中所说:“经济学方法论不会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但能‘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6]

就科学背景而言,在近代自然科学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原子论思想深深烙印在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中。牛顿曾以同质原子集结和绝对时空观为基点,完成了一次科学知识的大综合,其成果不仅表现为一个具有解释性和预言性的理论体系,而且表现为诸多学科中的“原子主义运动”。热现象研究中的“热质”、电磁现象研究中的“点电荷”、化学反应研究中的“活化原子”、生命现象研究中的“细胞”、行为研究中的“反射”、感知觉研究中的“点状感觉”,实际上均充当着各自学科中的“同质原子”的角色。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规定不同领域的基质,而换得某一领域的单一性,似乎只要找到了一个领域的基质,就能像牛顿力学那样简明地透视这一领域的现象。在这种科学思想背景下,设定自利而理性的经济人并在这个基点上解释各种经济现象,无疑是一种方便的选择。

就方法论背景而言,20世纪初广为流行的逻辑经验主义充当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武库。逻辑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可观察原则、可证实原则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等观点,造成了持久不衰的经验逻辑分析运动,由此构建的原理性理论或构造性理论成为各学科追逐的目标。在这种方法论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用可测度的效用取代难以观察的价值,用实证的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取代形而上的伦理判断,并以此为中心构造其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也在情理之中。

在如此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背景下发育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方法论选择自然会倾向于个体主义,把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起点进而建立用尽量少原理解释尽量多经验的理论。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个体的实在性、优先性和基础性,并以个体的固有规定为基点合逻辑地推断群体行为。哈耶克指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过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7]这里所说的“其它方法”显然是指整体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关系的实在性、优先性和基础性,并从相互作用关系的特点出发解释群体以及加入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在主张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论者看来,现实存在的只能是一个个的个体,整体不过是个体的集合,离开了个体,整体将毫无意义,因而这是哲学上“唯名论”的必然结果,而整体主义的理论根源则是哲学上的“唯实论”。

这种看似水火难容的方法论分歧,从系统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实并没有如此严峻的意义。如果个体主义方法论者在从个体推断整体的过程中,能够充分注意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个体“固有规定”的约束和调节,如果整体主义方法论者在进行整体分析的时候,能充分注意整体得以形成的相互作用的来源及其条件,那么,两种方法论未必会导致迥然相异的结论。在自然科学中已被证明有效的递进性解释方法(其逻辑形式为:从低层规律、低层过渡到高层的相干条件、环境陈述的逻辑合取中推断出高层行为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同样有效的扩展性解释方法(其逻辑形式为:从高层规律、高层规律起作用的低层条件、环境陈述的逻辑合取中推断出加入高层的低层子系的行为特点),均很难完全归结为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把个体的“固有规定”先验化、绝对化、凝固化,以致把个体间的相干性相互作用理解为线性的叠加的相互作用,那么,方法论的失误将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缺陷。正是在这里,现有的经济人假设面临着有待走出的误区。

如上所述,斯密在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的时候,使用了演绎推理方法,把利己之心看成从常人的内省和观察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经验性命题,无需证明地引用为前提假设,尔后在供求关系的竞争中演绎出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并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由于供求、竞争中的交换以自愿和等价为原则(无任何形式的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因而,它不仅不限制自利的前提,反而在客观上会造成利他的结果。这种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逻辑相当于私利叠加为公利。从方法论上看与牛顿把时间、空间、惯性作为无需证明的前提并借助于力的独立起作用原理而构造其力学体系并无原则不同。

尔后兴起的边际革命在把高等数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此推进了经济理论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进程。然而,当把个体的自利推向边界、推向最大化的时候,其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显得更加彻底。斯密的自利性虽然也指向个体,但由于存在着“看不见的手”,从而客观上还会有利他的结果。而在边际分析中,经济活动的主体被抽象为单一的、清一色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被简

化为非人格化的“市场”和“价格”后,并不影响目的的设置和手段的选择,至于社会变化、背景知识对个人动机的影响,则更无从谈起。

边际革命所推进的均衡理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按这个框架,经济活动的主体被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种,他们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完全理性假定的引入,又使消费者能根据预算约束将其效用函数最大化,以致其全部收入购买的各种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与购买这些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的比例相等,实现消费者均衡。同样,完全理性的生产者也能根据资源约束和生产技术将其利润最大化,以致其所购买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这些要素的价格之比相等,使要素达到最佳组合,实现生产者均衡。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所造成的均衡价格,既是供求关系的宏观指标,又进一步调节供求关系,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在这里,自利的经济人不仅能在边际分析中设置最大化的目标,还能完全理性地找到使最大化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甚至还会借助于各种均衡而使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微观上的自利和理性与宏观上的资源配置最优化被阐释为内在一致的统一体。当阿罗和德布鲁将上述思想表示为精美的数学式后,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的精确性远非古典经济学可比,而其方法论原则却与斯密的个体主义一脉相承。

在布坎南和贝克尔等将这种范式推广应用于非市场决策时,虽然泛化了效用函数,将威望、权力、荣誉、健康、历史地位等均视为商品,但是这种泛化不过是扩展了自利的内容和理性计算的对象,并不改变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依据的是赋予个体以自利和理性的固有规定,并以此种先验的规定为基点推断政治活动乃至一般社会活动。

当然,在研究线路上遵循从个体推断整体的方法并无原则不妥。问题在于,当赋予个体以先验的“固有规定”,并以这些规定为逻辑前提而推断整体行为的时候,如果忽视了个体之间的相干性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对个体规定的调节,就难免不出现理论上的失之偏颇,以致减少其解释和预言能力。经济人假设就面临此类问题。比如,均衡理论就很难完全说明,生产者之间为什么需要结合为“企业”?消费者为什么不会去进行生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换为什么需要“市场制度”?公共选择理论也很难完全说明为什么会有日益扩展的基金组织、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机构?家庭经济学也很难完全解释利他行为为什么会超出家庭界限向市场蔓延?

可以看出,个体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缺陷并不在于它主张从个体规定推断整体行为,而在于它把个体规定先验化、凝固化,并因此而使它常常过于简单地处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改进经济人假设的一条可行之路是充分重视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这种相互作用的形成条件、运作条件、调控条件以及进化途径,以此为基点透视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此秩序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

从而使经济理论实现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2]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粹[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95.

[3][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2、6.
[4]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8.
[5]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7—9.
[6]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80.

(责任编辑 成素梅)